从《诗经》、两汉乐府民歌 看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

蔡守湘 李进才

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曾有过长期的讨论，虽然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对于我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它出现在什么时代？它的文学理论成熟于哪个时候？它与积极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有何区别？这一系列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今天重新探讨这些问题，我们觉得应从以下两个方面探入：

首先，要克服以往讨论中存在的偏向：

一、不能拘泥于恩格斯的定义。恩格斯在给哈克纳斯的信中，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所下的定义提到“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主要是对欧洲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和戏剧的创作经验所作的科学概括，而不是一切国家、一切时代、一切样式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普遍规律的反映，因此也就不能把它作为判断什么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衡量什么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唯一标准。事实上恩格斯也没有因为哈克纳斯的《城市姑娘》没有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而否定它是现实主义的作品，相反还肯定了这部作品具有“现实主义的真实”。他在致敏·考茨基的信中所强调的是“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我们应当根据他的这些论述的精神实质来理解什么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从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样式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出发，作出具体

的恰如其份的分析。二、不能把欧洲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硬套我国古代文学。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产生，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有着联系，而我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始于《诗经》的时代，通过尔后的发展而存在于各种文学样式之中。如果不顾我国的特殊性，而硬要把它纳入欧洲现实主义文学历史的框子中，认为只有在我国孕育出了资本主义因素之后，才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出现，才有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成熟，这必然会抹杀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和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三、不能忽略现实主义文学有一个产生、发展和不断丰满完善的过程。在这里，应先肯定在我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自古有之。所谓创作方法，就是艺术地认识和表现生活的方法。只要出现了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体现出了某种艺术地认识生活和艺术地表现生活的共同法则，那么也就有了某种创作方法的存在。而随着文学创作实践的不断发展和深入，它也就不断地丰满和完善。因此，拿后期完善的现实主义文学来否定早期的现实主义，便不是历史地看问题。四、不能因着重探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原则、基本精神，而忽略对其艺术表现方面的特征的探讨。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它必然是既包括创作原则、创作

精神方面的问题，又包括艺术表现方面的问题，在探讨什么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时，就得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对它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并看出它同其它创作方法的区别。

其次，应总结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经验。探讨我国古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研究前人的理论固然是必要的，但是文学理论是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因此首要的应从分析我国古代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出发，从总结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经验去深入。

我国历史悠久，有着数千年的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学。以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所开创的、经过汉乐府民歌而发展壮大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同以我国古代神话开创的、经过屈原《楚辞》而发展壮大的积极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构成了两个巨大的进步的创作流派，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根据对上两方面的浅薄认识，拟就从分析《诗经》和汉乐府民歌中的现实主义作品入手，来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做一番粗浅的探讨。

一 真实地描绘社会生活

从《诗经》和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诗篇中，可以首先看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真实地描绘社会生活。

产生在西周初年汇集在《大雅》中的叙事史诗，它们所真实描绘的就是郑玄在《诗谱序》中所说的周人自他们的始祖后稷“播种百谷”，发展农业生产，逐步兴旺发达以来，到文王、武王“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这一西周奴隶制王朝兴起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社会生活的面貌。

如果说《大雅》中的叙事史诗是通过描写历史事件来反映历史的真实的话，那么产生在西周中期以后到春秋中叶的“变风”“变雅”则是通过抒情的方式来真实地描绘社

会生活的。它们被公认是《诗经》中的精华，就是因为它们深刻而全面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大动乱大变革的社会情况。《毛诗序》说：“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这说明了它们产生的社会基础，反过来也说明了它们对这种急剧变革的社会现实做了如实的反映。因为它们基本上都是抒情诗，所以它们对社会生活所做的真实反映，是通过诗人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来表达的。而诗人所抒发的真情实感，又来源于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是所谓“感于物而动”，“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是所谓“感于事，动于情，而发于吟咏”。这个“物”和“事”，就是真实存在的客观现实，包括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但诗人因自然现象而引起吟咏，乃是由于诗人先有对社会生活的真实感受而产生的喜怒哀乐之情凝结在心，然后才会在自然界的触发之下，通过赋诗言志把它们倾吐出来。正因为如此，所以诗人的抒情也就能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对这个问题，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篇中已有所论及，他说《诗经》中的作者是“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的，是“为情而造文”，而不是无病呻吟，故其诗篇也就明显地体现了“要约而写真”的创作原则。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不妨将“变风”、“变雅”这些抒情诗稍加分析。先说产生在西周中期以后至西周灭亡前后的“变雅”中的讽谕诗：它们的作者是奴隶主阶级中的人员，有的具有政治眼光，对当时的黑暗现实感到不满；有的因受当权势力的排斥打击，而对这时的政治腐败有了较清醒的认识；有的属于卑下的士阶层，对现实中严重的劳逸不均满怀激愤；他们所写的讽谕诗，通过抒发自己的真实感触，也就强烈地批判了统治集团的荒淫残暴及其政治的黑暗，揭露了统治阶级内部日益激化的矛盾冲突，反映了西周中期以后王道陵迟，特别是周厉王、周幽王时代“政教尤衰，周室大坏”，招致戎狄内侵，诸

侯外叛，战祸频繁，人民大量逃散和死亡的社会现实，真实地描绘出了一幅西周王朝“邦国殄瘁”的图画。

再说产生在西周中期以后至春秋中叶的“变风”“变雅”中的民间抒情诗：它们所抒发的是人民的思想感情，更以深刻的现实主义的艺术笔触，广泛地描绘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表达了人民的疾苦。其中有的反映了西周时代奴隶们遭受的残酷的剥削及野蛮的蹂躏；有的揭示了“国乱民散”的东周时代民众生活的极端贫困；有的或吟歌为“王事靡盬”而昼夜行役的征夫的哀伤，或抒发为怀念征人、悼念亡夫的思妇孀妻的悲恸，展现了两周时代沉重的兵役和劳役给广大人民造成的父子生离、夫妻死别、家庭毁灭的悲剧；有的倾诉了两周时代民众因忍受不了统治阶级残暴的压榨和社会的动乱而逃亡异乡的痛苦；还有的描写了沦落为流浪乞食者的民众“独行踽踽”的忧戚。这些诗篇，何休在《春秋公羊传解诂·宣公十五年》中说它们是“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之作，这也说明了它们所表达的是人民的真实感情，所吟咏的是生活中的真实事件。二、“变风”中那些为数不少的揭露和批判各诸侯国统治者荒淫糜烂及其道德败坏的诗篇，无疑也是当时社会生活中一个方面的真实写照。三、“变风”中的大量爱情诗，是“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的作品，表达了里巷中男女青年热烈追求自由真挚的爱情的愿望；而《邶风·谷风》和《卫风·氓》这两首我国最早出现的弃妇诗，还抒发了弃妇的悲愤；它们也都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到了汉乐府民歌，除了抒情诗之外，还出现了大量的以第三者的身份，围绕中心事件和中心人物进行具体描绘，具有一定故事情节的完整的叙事诗。徐祜卿在《淡艺录》中说：“乐府往往叙事，故与《诗》殊。”所谓“殊”，除了表现手法有许多不同之外，在反映生活

的问题上，与《诗经》抒情诗比较，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即作者以旁观者的身份，通过对客观事件做具体的描写，来真实地描绘社会生活的。如果说《诗经》中的抒情诗是“为情而造文”，那么乐府民歌中的叙事诗也可以说是“为事而造文”。而在乐府民歌中，不论是抒情诗还是叙事诗，都继承和发展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全面而真实地展现了两汉时代的社会面貌。

在地主阶级横征暴敛之下，两汉时代人民的生活是异常痛苦的。透过《妇病行》所描绘的贫民的悲剧性的生活，可以清楚地看到两汉时代由于大地主官僚肆意兼并土地，“广其田宅，博其产业”，^①而使广大民众陷入水深火热之境的残酷的社会现实。《平陵东》还真实地揭露了官府为榨尽民脂民膏，竟采取强盗手段，公然对民众进行绑票这种暗无天日的社会现象。《相逢行》写大官僚地主黄金为门，白玉为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郸倡”，鲜明地反映了“豪富之室，……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乐妓列乎深堂”^②那种骄奢淫逸的生活，揭示了贫富的悬殊。

两汉的兵役劳役也十分沉重。西汉时代发动了一些非正义战争，而在东汉时代实行民族压迫政策，非正义战争也就更多。每次战争都迫使大批年轻的农民辞父别母，抛妻弃子，远征绝域，或战死沙场，暴尸荒野；或长期戍守，离乡背井。《战城南》和《十五从军征》就描绘了这种社会现象。而通过《饮马长城窟行》还可看到两汉时代“近者数千里，远者过万里”的繁重劳役所造成的“父母愁忧，妻子咏叹，愤懑之恨，发动于心，慕思之积，痛于骨髓”^③的沉痛的现实。

至于汉乐府民歌中的爱情诗，或写对真挚爱情的追求，或写对负心男子的谴责，或写弃妇的辛酸，或写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所造成的爱情悲剧，以及在婚姻问题上描绘民间妇女对强暴势力的反抗，如此等等，也广泛地再现了两汉时代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

正因为汉乐府民歌真实地描绘了两汉时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表达了人民对生活的愿望，所以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它们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二 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

以上事实清楚地说明了《诗经》和汉乐府民歌中的现实主义诗篇，无论是描写历史，还是描写现实；无论是抒情，还是叙事，都真实地描绘了社会生活。但问题不仅如此，如果再深入一步分析和总结，还可发现它们既真实地描绘了社会生活，又真实地描绘了现实关系；既写出了事物的一般情况，又写出了事物的实质性问题；既反映了社会生活中的个别现象，又反映了社会生活中的普遍现象；从而这些诗篇也就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本质，体现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又一个基本的而且是更重要的特征。

就说《诗经》中的叙事史诗吧！它们不但反映了西周奴隶制社会兴起的一般过程，而且还反映了它在兴起的过程中不断变革着的社会关系。例如通过《公刘》所描述的“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等等情况，即可看出这时周人的部落联盟已进一步扩大，原始公社趋向解体，产品已有剩余，首领已凌驾在部落人员之上的这种发展演变而来的社会关系。通过《绵》所描述的“乃召司空，乃召司徒”，建宫室，立大社等等情况，又进而看到了周人发展到古公亶父时，已建立了“统治和压迫的机关了”。描绘出了这种变革中的社会关系，自然是反映了社会生活中的本质现象。

再看“变雅”中的讽谕诗，它们通过真实地描绘西周中期以后的政治黑暗，周王室的一蹶不振，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重重等等社会现象，深刻地揭示了西周王朝“国既卒斩”，奴隶主阶级“大命已倾”，西周奴隶社会灭亡的必然性，展现了大变革时代历史发展的趋

势，打破了以往所谓“君子万年，保其家邦”——西周奴隶制王朝永世长存的幻想，这不是很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本质么？

《诗经》和乐府民歌中那些描写人民疾苦的诗篇，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以个别反映一般。朱乾在《乐府正义》中说：“读《饮马长城窟行》，则（知）夫妻不相保矣，读《妇病行》，则（知）父子不相保矣。读……《孤儿行》，则（知）兄弟不相保矣。”说明了这些诗具有典型意义，是通过对个别典型事件的描写，反映了社会生活中带普遍性的问题。再就《十五从军征》来说，诗中讲“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妇”，似乎太夸张了，其实是以典型的描绘，来反映沉重的兵役所造成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宋书》卷一百载沈亮对南朝宋文帝说：“伏见西府兵士，或年八十而犹伏隶，或年始七岁，而已从役。”可见八十老翁还在服役当兵，并非汉代独有的社会现象。

其二、真实地反映了阶级关系。在阶级社会里，所谓现实关系，主要是阶级关系。《诗经》和汉乐府写人民苦难的诗篇，不仅写出了人民苦难生活的现象，而且揭示了造成人民苦难生活的根源，揭露了剥削阶级的反动本质；不仅描绘了人民痛苦的号呼，反映了贫富的悬殊，而且表达了人民迫切要求改变不合理的现实的愿望及其强烈的反抗精神。《豳风·七月》写奴隶主迫使奴隶们终年劳累而不得温饱，《平陵东》写官府的敲榨勒索，《唐风·鸛羽》写行役者的怨天尤人，《魏风·伐檀》写奴隶们对不劳而获的奴隶主的强烈质问和讽刺，它们都是以艺术的典型，概括了生活中的本质，真实地反映了现实中的阶级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魏风·硕鼠》，它还明确地宣告了不是奴隶主养活了奴隶，而是奴隶养活了奴隶主，并写了奴隶们发誓要同压迫和剥削他们的奴隶主阶级决裂，去寻找理想生活的“乐土”。虽然这只是乌托邦式的幻想，但却反映了奴隶们的阶级

觉醒和强烈要求改变不合理的现实的心情。正是这种阶级觉醒和对理想生活的追求，促使他们揭竿而起，推动历史的前进。在这方面，乐府诗中的《东门行》更富有典型意义，它写一位贫民在饥寒交迫之下，抑制不住满腔的怒火，“拔剑东门去”，决心用暴力来改变不合理的现实，深刻地表现了蕴藏在人民心中的强烈的反抗精神。此外，《诗经》中写统治者荒淫糜烂的诗篇，汉乐府民歌中写大地主奢侈豪华的诗篇，暴露了剥削阶级的反动本质，表达了人民对他们的厌恶和谴责，同样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关系。

《诗经》和汉乐府中的爱情诗，也各自在不同的程度上体现了社会生活的本质而具有典型的意义。这是因为：其一、它们反映了阶级社会中的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就是民间广大青年追求自由而真挚的爱情。其二、这种爱情观念又是同统治阶级的爱情观念相对立的。对此，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就曾明确地指出过。其三、具有鲜明的反抗统治阶级的吃人的礼教的意义，实际也是体现了阶级社会中一种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在这里，应特别提到的是乐府中杰出的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它通过对刘兰芝和焦仲卿的婚悲剧的具体描写，用血和泪控诉了封建礼教及其婚姻制度的罪恶，歌颂了刘兰芝夫妇宁死不屈的反抗精神，深刻地表达了广大青年争取婚姻自由的意愿。因此，它是更深刻、更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的本质。乐府中另一首杰出的叙事长诗《陌上桑》，它揭露了那些依仗权势玩弄妇女的封建官僚的丑恶嘴脸，表达了人民群众反抗强暴势力的要求，也具有深刻的典型的意义。

《诗经》和乐府中的现实主义诗篇，既真实地描绘了社会生活，又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本质，因而也就体现出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同自然主义创作方法的区别。自然主义的作品虽然也逼真地描绘现实中的事物，但由于其所描写的是生活中的琐事，甚至是色情下

流的东西，所以也就下能反映生活的本质，不但不具有典型的意义，有的还有着腐蚀性的不良作用。

三 题材与细节的真实性和典型性的统一

题材与细节的真实性和典型性的统一，是《诗经》和汉乐府民歌所体现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又一个基本的特征。由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真实地描绘社会生活，所以它要求题材和细节的描写必须具有真实性；又由于它要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所以它又要求题材和细节的描写必须具有典型性。

现实主义文学是直接来自现实生活或历史事件中吸取创作题材的，因而其题材也就具有现实的或历史的真实性。后者如《诗经》中的叙事史诗，前者如《诗经》和乐府中的抒情或叙事的现实主义诗篇。关于前者：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所谓“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说明它们都是以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事”做为描写的题材的。无论是以真实的历史事件、还是以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事”做为创作的题材，都并非全是历史的或现实的生活中的原型，而是对其素材经过不同程度的选择、剪裁、集中和概括的，因而也都具有典型性。或是描绘了历史上起过某种进步作用、具有某种积极意义的人物和事件，或是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带普遍性的、为人民所关心、所迫切要求解决的社会问题。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所体现的这种题材的真实性和典型性的统一，也显示出了它同其它创作方法的区别。积极浪漫主义的作品，虽然也具有现实性的基础，也能反映生活中的本质，如屈原的《离骚》。然而它们可以用神话故事或凭幻想虚构出来的超现实的事件做为创作的题材，而不必是现实生活中实际具有的或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自然主义的作品是照相式的描绘生活，因而在题材上也就做不到真实性和典型的统一。

关于现实主义文学的细节描写，从《诗经》和汉乐府民歌中可以看出它们是来源于生活的真实，是从社会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既符合生活中的本来的样子，又包含着某种本质的意义。如《诗经》中《王风·君子于役》所描写的自然环境的细节，《唐风·葛生》所描写的人物内心独白的细节，《秦风·黄鸟》所描写的被殉葬者的凄惨情态的细节，以及乐府民歌中《有所思》所描写的人物内心活动的细节，《十五从军征》所描写的社会环境的细节，《东门行》所描写的人物动作和人物对话的细节，如此等等，都是匠心独运，具有高度的真实感，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作品的主题思想和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人物的形象，体现了生活中的本质现象。由于乐府民歌中出现了大量的叙事诗，它的细节描写比起《诗经》中的抒情诗来，要丰富和细腻一些。尤其是《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其细节的描写也就更加典型、更加丰富多彩。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这种细节描写的真实和本质的真实的统一，也显示出它既同自然主义不同，又与积极浪漫主义有别。自然主义的细节描写虽有其真实性的一面，但繁复琐屑，不能体现本质的真实。积极浪漫主义的细节描写又多是幻想的产物，突破了生活的真实，具有超现实的特色。这只要分析一下屈原的《九歌》和《离骚》中的细节描写，便可一目了然。

这里结合探讨一下现实主义创作方的艺术艺术表现的问题。在艺术表现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也有着自已鲜明的特色，而显示出它同积极浪漫主义的区别。这主要体现在铺陈、比兴、夸饰等问题上。现实主义文学既要抒发感情，描绘生活，自然要铺陈其事，而且“赋（铺陈）”体还是它最常用最基本的表现手法，但是却却没有浪漫主义的那种极力的铺陈。谈到比兴，郑众说：“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朱熹说：“比者，以此物比彼物也；兴者，先言它物以引起其所咏之辞也”。不管他们对《诗经》中的比兴的解释有何

不同，但他们所说的做为比体和兴体的“物”，都是指客观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事物。考察《诗经》和汉乐府民歌中的现实主义诗篇，其比兴莫不如此，所引用的都是现实中常见的事物，因而具有平易和符合生活中的常识的特点。而积极浪漫主义诗篇中的比兴，常用超现实的或突破了生活中常识的事物，所以它们的比兴显得很奇特。至于夸饰，《诗经》和汉乐府民歌，一般是朴质自然，口语化、通俗化，不雕章琢句追求华丽的藻饰。其艺术的夸张，如《王风·采葛》：“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大雅·云汉》：“周馥黎民，靡有遗孑”。这种夸张只是对一种意思的强调，为生活中的情理所允许的。因此它们是“夸而有节，饰而不诬”。而在积极浪漫主义作品中，往往运用的是幻想的、超现实的、巨大的夸张，如我国古代神话中说的共工用头触折了不周山，夸父饮干了黄河和渭水，以及《离骚》中写上下求索的扈从，盛，是龙驾车，凤承旗。如此等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很难采用的。

四 强烈的批判性和战斗性

强烈的批判性和战斗性，也是《诗经》和汉乐府民歌中所体现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一个重要的特征。纵观《诗经》和汉乐府民歌中的现实主义诗篇，它们的批判有的是采用直述其事的方式，如《小雅·节南山》直述执政大臣尹氏搞裙带政治的过失，《小雅·十月之交》直述执政大臣皇父的结党营私，一般说“变雅”中的讽谕诗，大都采用这种方式；有的是采用强烈质问的方式，《小雅·何草不黄》、《魏风·伐檀》等等就是如此；有的是采用比兴微言婉讽的方式，例如《邶风·北风》和《小雅·采芣》，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前者是“假风以刺威虐也”，后者是“因雪以愍征役也”；而乐府诗中的叙事诗，它们的批判性，一般都是通过对客观现实中的典型事件的具体描绘而自然地流露出来的，如

《妇病行》、《东门行》、《平陵东》、《十五从军征》、《孔雀东南飞》等等即是。在这些诗篇中，有的批判还是十分尖锐的，如《大雅·桑柔》直斥执政大臣为“贪人败类”；而《小雅·四月》甚至把周幽王都骂做“莫知其尤”的“残贼”。总之，《诗经》和汉乐府民歌中的现实主义诗篇，充溢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和闪耀着战斗的光芒，把矛头指向了统治阶级的荒淫腐朽及其政治的黑暗，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种种社会弊端，喷发出了人民要求正义的呼声，跳动着人民群众要求改变不合理的现实的思想脉搏，开创了具有人民性和民主性的优良传统。

《诗经》和汉乐府民歌中的现实主义诗篇，之所以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和战斗性，是因为在阶级社会里，存在着尖锐的阶级矛盾；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存在着激烈的冲突，甚至能发展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对立和敌视”，④其中的一部分人还会分化出来，走向接近人民的道路，同情人民的疾苦。作为被压迫阶级的民间歌手和由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进步文人，他们对于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对于统治阶级的荒淫腐朽，对于政治的黑暗，必然会产生强烈的不满，他们在从事创作的时候，自然会对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进行不加粉饰的描绘，并灌注批判现实的精神。尽管由于他们的身份不同，以及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批判的深度和广度存在着差异，同时也不可能否定剥削制度；但是，他们的批判毕竟有助于唤起改革现实的欲望，这无疑对于历史的发展和文学的发展都是起过巨大的促进作用的。

对于现实主义文学所具有的强烈的批判性和战斗性的特征，古人早已进行过某些总结。孔子说《诗》“可以怨”，就肯定了《诗经》具有批判不良政治的社会作用。对于“变风”“变雅”，《毛诗序》说它们是“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郑玄在《诗谱序》中说它们是“怨刺相寻（继）”。刘勰在《文心

雕龙·情采》篇中说它们是“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刘勰还说《诗经》中的比兴是“比则蓄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⑥。这些言论都肯定了《诗经》的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到了唐代的陈子昂，还大声疾呼地要求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高举“风雅比兴”和“汉魏风骨”的战斗旗帜，来纠正齐梁以来“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颓靡文风，使诗歌创作干预现实，为改革政治服务。后来白居易更是迫切地要求唤起这种批判精神，揭露政治的黑暗，指斥社会的弊病，反映人民的疾苦，以便“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为革新政治和改造现实服务。这一切深刻地说明了《诗经》和乐府民歌中现实主义的批判性和战斗性，是与它们的人民性和民主性紧密联系在一起，对后世发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

五 深刻的认识价值

《诗经》和汉乐府民歌中所体现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要求真实地描绘社会生活和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定着它的创作题材和细节描写的真实性与典型性的统一，并具有批判的精神，因此运用这种创作方法所创作出来的作品，也就具有深刻的认识社会生活的价值。

积极浪漫主义的作品有着现实性的基础，也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本质，所以也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但因为它对社会生活往往是超现实的折光的反映，突破了题材和细节的真实性，所以它让读者所看到的是社会生活的总体面貌，各种事件的大致情况以及社会矛盾的一般影象。而现实主义作品由于它的题材和细节都来源于生活的真实，所以读者不仅可以从中看到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总体面貌，而且还可以看到生活中的具体情况和事件的真实细节；不仅可以看到各种社会矛盾的一般影象，而且还可以看到各种社

会矛盾的具体表现，因而现实主义作品可以引导读者从各个方面去形象地认识社会生活，并形象地把握社会生活的本质。恩格斯在给哈克纳斯的信中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人们可以从中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的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这深刻地阐明了现实主义作品所具有的巨大认识作用。

《诗经》和汉乐府民歌亦是如此。如前所述，《诗经》中的叙事史诗，是西周社会兴起的历史缩影；“变风”“变雅”是周代奴隶制“礼崩乐坏”的一面镜子，乐府民歌是两汉社会面貌的真实画卷。孔子说《诗》“可以观”；班固说通过乐府民歌“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这些话就是对《诗经》和乐府诗的认识价值的肯定。对此，白温易在《策林》第六十九条中做了更全面地阐明。他说：“闻《蓼萧》之诗，则知泽及四海也；闻《华黍》之咏，则知时和岁丰也；闻《北风》之言，则知威虐及人也；闻《硕鼠》之刺，则知重斂于下也；闻‘广袖高髻’之谣，则知风俗之奢荡也；闻‘谁其获者妇与姑’之言，则知征役之废业也。故国风之盛衰由斯而见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这里所列举的诗篇，都出自《诗经》，所列举的诗句，出自乐府杂歌谣辞中的《城中谣》和《小麦谣》。正因为《诗经》和乐府中的现实主义诗篇具有巨大的认识作用，所以它们还是历史学家研究先秦及两汉社会的形象化的珍贵资料。郭沫若先生用《诗经》中的诗篇来考证西周时代的社会性质及其演变、农业生产发展的状况、阶级关系和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等等，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现实主义文学所具有的这种巨大的认识价值，也就使它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放射出了经久不息的光辉。

* * *

在《诗经》和汉乐府民歌之后，我国现实主义诗歌创作一直继续地向前发展着。特别是到了中唐时代，经过杜甫、白居易等人的大力创作，就跃入高峰。其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也就表现得更加丰满和鲜明。尔后随着小说、戏剧这些新的文学样式的兴起、发展和壮大，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特征也因而发展得更加充实和全善，这突出地体现在描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问题上。

数千年来，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不管是在先秦时代还是在明清时代，也不管是在诗歌创作方面还是在小说、戏剧创作方面，尽管有着产生、发展和成熟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完美程度的差异，尽管有着文学样式的不同而带来的某些不同的特征；但是，它所体现的真实性、典型性、题材和细节的真实与本质真实的统一性、战斗性和巨大的认识价值等等，却是一脉相承的，贯串在我国整个古代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始终，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进步的文学创作的潮流，对社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今天深入地探讨、研究和批判地借鉴我国古代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对于建立我国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 ① 《汉书·食货志》。
- ② 《后汉书·仲长流传》。
- ③ 《盐铁论·徭役》。
-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3页。
- ⑤ 《文心雕龙·比兴》。